



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三次全体会议

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下午6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 (卡塔尔)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萨利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持会议。

下午6时05分开会。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卡瓦列罗斯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卡瓦列罗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卡瓦列罗斯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科洛姆·卡瓦列罗斯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向主持本届会议的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表示敬意。他在联合国的长期经验有助于我们工作取得成功。

我也赞赏卸任主席、瑞士的约瑟夫·戴斯先生所做的出色工作。我国代表团同戴斯先生进行了非常密切的配合，我们可以证明他对联合国的非同一般的承诺以及他强有力的工作能力。

我也向潘基文秘书长表示敬意。我重申我们对他的管理的赞赏，并祝贺他当选连任第二个五年任期。

我感谢他对我国和中美洲的支持，这一支持尤其表现在他最近对危地马拉的访问。

我在担任总统的4年中出席了每一届大会，这证明了我们联合国的支持，以及我们对联合国的支持的感谢。

这是一个独特的场合，原因有二。

第一，我可以把我的政府在过去4年中的成就，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告诉大会。第二，我可以汇报，仅在10天前，我国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平静、正常的气氛中，举行了第一轮普选，从而巩固了我们在建设一个民主和参与性社会方面的进展。

那么，让我首先就危地马拉的进展讲几句话。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制造了不同寻常的障碍、2009年危地马拉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按照法治以及调查中揭示的真相解决了这场危机、导致实行109天紧急状态的3次重大自然灾害带来了影响，以及我们现在和今后将面临历史性挑战，尽管如此，危地马拉还是取得了这些进展。

我将用下面几句话来总结我的任期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的政府通过处理50年来无人问津的社会问题，把个人作为优先事项。我们设法减少贫困和极端贫困，取得了具体成果，尤其是通过我们的社会凝聚力方案，特别是向超过94万极端贫困家庭的母亲有条件地转让现金。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第二，在过去私人企业主导的领域中，为国家收复了空间。

第三，通过改组安全部队和提倡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而不是共存的政策，我们开始遏制和扭转早期开始的令人震惊的犯罪暴力升级。

第四，按照这些措施，我们收复了以前被毒品贩运者控制的大片领土，特别是北部佩滕省超过 138 000 公顷的玛雅生物圈；48 000 头牛被逐出该地，并且政府已经重新控制它。我们缴获了空前数量的毒品。在三年半中，我们缴获了 120 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将近两倍。相比之下，在我的政府上台之前的 8 年期间，收缴数额勉强达到 10 亿美元。

不管我们在中美洲地区、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作了多少努力，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控制毒品消费。毒品消费国必须接受对于我们各国每天发生的杀戮，以及对于进入它的无管制的武器销售的共同责任。它们必须对控制洗钱和在我们地区带来死亡的武器，承担共同责任；并且要对控制用于毒品生产的前体化学品的制造工厂，承担共同责任。必须对产品和武器的目的地，承担责任。

没有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支持，我们便无法控制中美洲的有组织犯罪。只有当消费者市场尽己之责，我们才能赢得这场战斗。我们不能继续流血和被子弹打伤。这不公平。消费者市场必须承担真正的共同责任。

第五，为了实现更大透明度，我们通过了一系列广泛的政策。其中包括成立透明度秘书处和通过一项公共信息法。

第六，我们更新和升级了能源组合，使其更加有利于环境，并且抵御碳氢化合物费用不断上升的影响。

第七，我们在贫困地区提倡两个主要的经济走廊。此外，北方横向地带的建造，将把墨西哥的恰帕斯州同我们的邻国洪都拉斯以及波洛奇克河谷连接起来。

第八，我们奉行富有活力的外交政策，使中美洲地区立足于新的起点，并且能够更加密切同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邻国之间的了解。稍后我将回头谈这个问题。

第九，城市的权力获得充分的尊重并得到加强，它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中的第四种力量。

第十，国家不同机构之间的独立性，得到忠实的遵守。

最后，尽管做到了我所描述的一切，但是我们保留和改进了一个牢固、稳定的宏观经济制度。危地马拉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没有萎缩的三个国家之一。

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需要每一个国家机构的参加；我们需要共和国议会的立法，需要我国司法系统中各机构的裁决。除其他外，我要提到我们同危地马拉许多年来经历的有罪不罚现象所作的斗争。危地马拉家喻户晓的 7 名头号通缉毒贩现已踉跄入狱，等待受审。政府已开始审判在 1996 年结束的 36 年内战期间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在一些案件中已经作出判决，另一些审判正在继续进行。

我谨在此强调联合国通过在危地马拉打击有罪不罚国际委员会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联合国的这项独特工作，不仅获得我的政府，而且也获得危地马拉民间社会的大力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该委员会的任期被延长了两年，到 2013 年 9 月为止。我们赞赏它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在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我要提及以下各项。

第一，尽管在社会事务中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承认，为消除贫困和提高危地马拉人民的福祉水平，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多年来，人民遭到忽视，特别是儿童、单身母亲等最弱势的群体，以及土著居民中的一大部分。

我深信，应当通过社会凝聚力方案和总统方案，把所采取的行动制度化。为此需要大幅度的财政变革，为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应当认识到，即便在中

央政府的提倡下，就像我的政府所做的那样，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和参加，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经济事务中，我们必须在财政稳定和为了发展筹资而进行财政改革的框架内，恢复生产活动。

第二，由于我国的地理位置，危地马拉已成为非法活动，包括毒品贩运和人口贩运的重要过境点，两者日益掌握在跨国犯罪组织的手中。我们为处理它们和满足公众对于增加每个公民的安全的要求，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必须进行区域和国际合作。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成员国通过了历史性的《中美洲安全战略》，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在6月22日和23日在危地马拉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共同把它提交给国际社会。主要之点在于，我们采取了有力的行动，但是必须执行需要资金的22个项目。

在此我回顾墨西哥的卡尔德龙总统在6月会议上所说的话，如果我们地处加拿大的北面，中美洲、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就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只是改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会消除毒品贩运问题。我再次强调毒品消费市场的共同责任。

第三，当我们一再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最近自然灾害每年至少发生一次——促进发展就有困难。这种情况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气候变化，因为中美洲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现象的影响。因此，人类必须携手捍卫我们的共同生境：我们的星球。迄今的进展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倍努力，在将于12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下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上采取具体的步骤。

我在以往向大会发言时，最后都提到我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因为它影响联合国议程，或者说，受联合国议程影响。

我国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加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框架内的一体化进程。我们深信，作为该项积极政策的一部分，大约三周后我们将实现我国在多边层面的主要目标之一——大会将选举危

地马拉担任未来两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不仅会延续我国对联合国的承诺，而且还会加强我国外交政策，使我们面对广泛、复杂的外交议程。我们将本着负责和独立的精神，以遵守《宪章》所载各项原则和价值观的方式开展我们的工作。

我感谢本区域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核可了我国的候选国资格，并预先感谢所有会员国的支持。我相信，在选举安全理事会新成员时，我们将得到它们的支持。

本届会议的中心主题是调解。我重申我们充分致力于加强预防性外交和联合国所拥有的预防冲突工具。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接受制裁制度，只要这种制度出自安全理事会所作的集体决定。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反对单方面采取的制裁和强制性措施。在这方面，我们敦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弃对古巴共和国的经济封锁。我们认为，这样一项步骤会在美古两国之间产生许多有利后果。

我们正密切、充满希望地关注着影响北非若干国家的事件。这些事件将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显然，应当由这些国家的人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但在目前动荡不定的局势中，解决源自以色列国与其邻国之间对抗的长期冲突刻不容缓。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在安全和可防卫边界内与以色列国和平、和睦地毗邻共处的有生存能力的繁荣的巴勒斯坦国。我们理解，国际社会可以参与实现这一愿景的进程，正如通过由美国、俄罗斯联邦、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组成的所谓“四方”确实在做的那样。但实现这一愿景得由当事双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完成，而且应当通过直接谈判这样做，以便解决所有未决问题。

我们重申致力于重启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以使我们同加勒比和拉丁美洲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热情支持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把签署《特别协定》视为朝着解决我国与伯利兹之间长期领土争端方

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国内司法程序完成之后，《特别协定》将使我们两国能够通过国际法院寻求法律解决办法。我高兴地报告，危地马拉国会已经一致批准了该协定。下一步将是把它付诸全民投票。

按照古老的玛雅日历，今天是平衡之日，黎明之日。这一天，瓜卡玛雅人会唱歌，以宣告一个新黎明的到来。今天，我们来到一起，见证一个新的黎明。它应当是和平的黎明，减少贫困的黎明，和谐的黎明，尤其是尊重基本人权的黎明。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刚才所发表的讲话。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卡瓦列罗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瓦德总统（以法语发言）：塞内加尔欢迎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领导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的工作。因此，我向他和他的国家表示热烈祝贺。他在任职期间将得到塞内加尔代表团的支持。

我还对主席前任约瑟夫·戴斯先生为振兴和加强大会，以使其能够发挥《宪章》规定的作用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赞赏。

此外，我还再次向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为本组织所做的一切。

我要谈谈本届会议的主题——调解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联合国宪章》对预防冲突和解决争端作

出了若干规定。联合国创始国 66 年前在《宪章》中提出的这一目标，尽管已经取得显而易见的进展，但仍然远未实现。这项挑战与我们有关，因为它涉及我们所承担的使后世后代免遭战祸的集体和个体责任。

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重大冲突的幽灵已逐渐消失，但全世界数百万男男女女继续遭受新旧冲突的灾难性后果。

和平会以各种方式受到威胁。当在滋生政治怨恨及社会、经济和宗教冲突的沃土上，对抗占了容忍、尊重及接受我们的差异的上风时，和平就会受到威胁。

各国人民对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合理愿望得到的回应仅是无动于衷和拒绝对话、甚至蓄意镇压之时，和平也就受到威胁。有些国家的情形就是如此。

《联合国宪章》述及了我们的主题——调解，但还有斡旋和谈判等类似的理念。我愿谈点想法。我想说的是，把调解界定为一种机制：根据这个机制，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介入处于真实或潜在冲突中的双方之间，并力求使它们的观点相互接近，以期使双方作出让步并达成共识。这一点可以适用于国内冲突，也可以适用于国家间的冲突。

在此，我要提及批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的 1982 年第 37/10 号决议和 1998 年《关于预防和消除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争端和局势以及关于联合国在该领域的作用的宣言》（第 43/51 号决议）。此外，还可补充提及的是，1992 年 1 月举行的首次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之后起草的《和平纲领》（A/47/277），其中提出所谓通过预警和预防性外交预防紧张局势的理论。

事实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本组织能独自包揽一切。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层面的调解努力，例如区域层面的调解努力。可惜的是，非洲忘记了独立后经常使用的一种原创性机制：当事各国国家元首在其边界开会，直接消除他们的分歧。不幸的是，这一良好做法目前已不时新了，人们都喜欢通用的国际机制。

在两类调解——国内调解和国家间调解——中，我们西非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将仅限于提及这些经验，因为其中有些经验相当著名。

例如，关于国内冲突，当我还是一个反对党的领导人时，我本人曾应一些国家元首的请求而介入，因为他们赞赏我在国内问题上选择成为民主反对派，而不是开展武装民族解放运动。我经常卓有成效地把各方观点摆在一起，甚至让反对派参加各种政府。我本人后来就是这样做的。我同意参加由多次选举中一直是我对手的人所领导的政府。

我可以举几内亚比绍为例。该国问题是由三位国家元首联袂解决的，我是其中的一位。当几内亚比绍政府与军队发生冲突时，我们决定前往该国。我们成功地使该国秩序得以重建。有关三个国家是尼日利亚、加纳和塞内加尔。最近，科特迪瓦有危机。由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联合国和法国支持下所作努力，危机以皆大欢喜的方式结束。

我可以补充说的实例是，通过西非经共体的调解，尼日尔和几内亚-科纳克里局势正常化一事。尽管在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方面遇到困难，但调解取得了成功。我还可以举南苏丹国和平宣布独立为例。我赞扬这个兄弟国家在联合国这里的代表。

当然还有其他案例。我举这些事例只是要表明，在区域层面，许多冲突可直接由区域各国——有时在一个外部国家(如法国)的协助下或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来解决。

在这一长串国家的最后，我要说，仅在几天之前，由于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两国边界可能出现麻烦，西非经共体主席召集一个由邻国组成的小组开会。在联合国帮助下，我们得以建立一种防止科特迪瓦境内雇佣军干涉的机制。这些雇佣军当时正寻求进入利比里亚，以便在该国选举期间破坏其稳定。

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仍有其他潜在冲突，例如损害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的潜在冲突和达尔富尔的潜在冲突。

我现在来谈谈用于解决国家间冲突的调解。我仅举一个例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国之间的冲突。我赞扬多年来为拉近双方立场所作的一切努力。不幸的是，这些努力尚未取得成功。因此，今年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向大会提出希望承认它是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塞内加尔无疑支持这一申请。这一立场源自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特别是因为今天，塞内加尔是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塞内加尔支持在国际公认边界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也支持以色列国的存在，两个国家都在各自的疆界内生活。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但国际社会将继续尽其最大努力。

我借此机会澄清一件事情，因为尽管我同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亲近，但在几天之前，有人说我在扮演以巴冲突调解人的角色。内塔尼亚胡总统的理解有误。我从未担任过巴以冲突的调解人，也从未寻求过成为调解人。此外，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多，而不只是请求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来调解这样一个复杂的局势。

要找到解决问题办法需要的就是有诚意。既然被授予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我就必须无愧于这项殊荣。因此，但凡我能够介入找到解决办法，我就会自己负责这样去做。例如，几年前我曾以个人名义介入，争取让年轻士兵吉拉德·沙利特获释。

不幸的是，这未能成功，但根据有关方面的若干建议，我几天前再次提出该倡议。鉴于内塔尼亚胡总理所说的话，这似乎产生了一点反应。他说，他不希望塞内加尔调解，塞内加尔是巴勒斯坦的盟友。但他错了。我不是要调解，而是要斡旋；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一名青年获释，因为我认为这名青年应当身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监狱里，我还认为我能够说服有关方面——首先是巴勒斯坦方面，即巴勒斯坦现政府和哈马斯——使其认识到必须基于人道主义原因释放这名青年。

我要是成功了，很好；我要是失败了，这也不会阻止我重新开始。无论双方立场如何——换句话说，

无论以色列的立场和哈马斯的立场如何——我都会这样做。这符合我的和平理念，也符合我作出的选择，即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推动扩展合作。

我认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持续存在的恐惧和不信任情绪是可以得到缓解的——这就是我对我们秘书长提出的简单建议——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由双方挑选的三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这三个国家将进行讨论，确定双方需要有哪些保证才会承诺走谈判道路，以使两个国家即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能够共存，因为我认为目前不存在对话，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对话。我认为我的建议可以促进对双方立场的了解，并会有助于减轻恐惧和担心，而恐惧和担心是妨碍开展讨论和达成任何协议的主要心理障碍。

我的想法可能是错的。或许这最终不会有任何结果，但尝试一下并非坏事。我对秘书长说，“在你回答说‘不行’之前，我希望你能够花 40 天时间研究我的建议。如果 40 天后你觉得它无助于解决问题，你可以说‘不行’，但我请你尽量了解一下这项建议。”我可以讲得更详细，甚至可以提交一份文件。我确定了这一立场，并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意见，最终对其进行微调。

我在讲话的最后要谈谈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这个问题 18 年来翻来覆去地谈，但由于众说纷纭，我们未能取得进展。

目前的安全理事会制度有一些优点。安全理事会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必是必要的，但也必须加以改进。然而，安全理事会的目前运作中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对非洲视而不见。即便是在利比亚问题等最近的一些问题上，非洲也没有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我不想谈安全理事会总体改革问题。我知道改革不会朝夕之间就完成。但我也知道，安理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需要增加其席位数目，而且必须更好地分配这些席位。

我要求纠正非洲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有 75% 的问题是非洲问题，但非洲却

没有席位，就连在利比亚问题上都说不上话，而利比亚是一个非洲国家。因此，让非洲国家在安全理事会拥有一个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会是一件好事。我说的不是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必须是常任席位。

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因为几年前我曾与安理会成员进行过讨论，多数成员认为，如果能够将这个想法与更为宽泛的要求分开的话，那么它是合理的。但每次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情况都是进一步退两步。不过，我们不应气馁。

我现在谈谈最后一点内容，即环境和农业危机。这些问题也是和平问题，因为环境同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联系，而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首先是对非洲而言，影响尤为严重。

几年前，一位法国哲学家曾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为《非洲：死亡之地》。他在书中谈到了盐碱化和荒漠化问题，我自己的国家就存在这些问题。在萨赫勒地区，我发现这些话特别有根据。

首先，海岸侵蚀在加快。从摩洛哥到几内亚湾，海水通过一层层大陆架渗入大陆深处——480 公里之深——致使地下水盐碱化，导致民众日益缺乏饮用水。

海洋侵蚀并非只是说海岸受到海水侵蚀。它正在毁坏内陆土地，导致民众迁徙到能够找到饮用水的地方。它是历史上导致荒漠化的主要机制之一。有时，全部人口都被迫迁移。

但我们没有束手待毙。所以，我们建造了从达喀尔至吉布提、长 7 000 公里宽 15 公里的绿色长城。所以，我们呼吁欧盟资助由欧洲和非洲专家开展的一项研究，以便找到解决海水渗入大陆架的办法。

我们在塞内加尔修建了部分大西洋沿岸墙体，但只有两公里长，因为每公里造价很高——200 万美元。它将深入到花岗岩层，然后就不会继续了。我们不想建得太深，因为在环境问题上，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明确它会对其它地方产生什么后果。

所以，我们必须以完全科学的方式分析这个问题，因为被遏制的海洋力量并没有被消除，而只是被沙地和液体分散。专家可以查明情况，帮助我们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利用我们的资源来制止这种退化现象。可悲的是，这种退化现象正导致非洲大陆大片土地消失。海啸不仅是巨浪对海岸造成的影响。它也是我们大陆内部发生的破坏。我提到该现象，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威胁到非洲的巨大危险。

最后，我们最近举行了第二届达喀尔国际农业论坛，来讨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即便是我们这样的生产国也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因为我们同时也是消费大国。与会者提议成立全球农业管理组织。我们敦促把此类重要机构的总部设在非洲，而不是发达国家。此类大型组织的总部都不在非洲。帮助我们的组织必须和我们同在一地。

拟议组织的作用将是规范农产品价格和确保小型农户能够获得最低收入。我赞扬我们关于该问题的决议草案。该组织的政策可以是在减少生产力差距方面发挥作用。为何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力要高于非洲——比如津巴布韦？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

在塞内加尔，我们通过我们称之为“展开农业大会战，保障粮食富足”的计划来处理该问题。该计划旨在处理塞内加尔与意大利某些地区的生产力差距问题。它使我们得以从 2007 年粮食依赖外国的状况转变为粮食自给自足。今年，我们甚至可以开始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必须说，我们受到了机遇的帮助，因为化肥至少占 30% 的费用，而我国的化肥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配肥。此外，友好国家也帮助我们以十分优惠的长期条件采购重要设备。

本组织各项工作的范围和复杂性会使我们对其成就和挫折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促成我们对本机构作出承诺，给予我们在此所代表的各国人民以希望以及最终令他们相信和信任本组织的决定因素是，人们

认为本组织在进行审议、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时，不偏不倚地遵守了《宪章》所载的原则，即普遍性、合法性、正义和公正。

最后，这些价值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捍卫，是衡量本组织干预行动是否正当和能否取得成功的标准。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阿曼多·埃米利奥·格布扎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大会将听取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阿曼多·埃米利奥·格布扎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阿曼多·埃米利奥·格布扎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格布扎总统 (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我们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祝贺卡塔尔的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当选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主席。他长期的外交经历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议将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借此机会向他保证，我们完全愿意推动本届会议取得成功，并祝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一切顺利。

我们向前任主席、瑞士联邦的约瑟夫·戴斯先生致以祝贺，祝贺他全身心、务实和富有活力地指导了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工作。

我们也祝贺潘基文先生连任秘书长一职，这表明了会员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他致力于谋求并巩固和平、安全及国际发展的认可。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他的大力承诺下，我们将继续在联合国主持下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们欢迎联合国最新会员南苏丹共和国。我们与这个姐妹国家一起庆祝了它的独立，并在当时表达了我们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重大事件的祝贺。

本届会议是在人类历史的重要阶段举行的。这个阶段的特点尤其是：持续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影响；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局势紧张和政局不稳的温床再度出现，特别是在北非和中东；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大流行病盛行；自然灾害增多。这些挑战要求采取多边做法，以便找到协商一致、有效和可持续的对策。

确实，这些复杂现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导致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潜在因素。因此，必须注重根植于对话、包容性治理、问责和透明以及尊重人权的民主原则。

有鉴于此，我们赞扬为本届会议主题所作的选择，即调解对于预防暴力冲突、实现和平解决及加强和巩固互信的作用和重要性。这些是建立牢固、持久和平的关键因素。

我们大家都渴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和平与安全、和谐与协调应占据主导；消除贫困，防治流行病以及促进人类福祉与繁荣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危机激增和长期坚持不同立场，而不是寻找解决影响全人类的许多问题的办法，致使这个梦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因此，联合国加强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本届会议是在联合国大家庭纪念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逝世 50 周年之际举行的。今年也是我国已故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被种族隔离暗杀 25 周年。这两个人物是和平的热爱者和捍卫者，他们在为我们的母亲非洲各国寻求和平时丧失了生命。为了纪念这些伟大的名字和所有为作为和平解决争端手段的调解和预防外交献出生命的人，让我们大家重申对和平的承诺，加倍努力支持旨在建设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的举措。

调解应被视为一个使争端各方走到一起、减少其分歧以及唤醒良知的机会，以使它们能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不能在开始调解时假设我们有了所有答案；而是应以客观、公正、中立的方法展开调解进程，以确保利益攸关者在各个阶段的参与和拥有进程的自主权。这些是确保民族和解和重建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更为重要的建立互信的基本原则。

莫桑比克意识到这些原则，为积极参与了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大陆的一些不同调解进程而感到自豪。我们从而为帮助其他国家返回通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做出了贡献。因此，我们呼吁赞赏联合国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所发挥的调解作用。

联合国的普遍性赋予它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次要求本组织通过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以及通过建设和平委员会，在国际大家庭内承担《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促进调解者职责。

我们赞扬联合国所取得的进展，它对预防、减少及调解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冲突的影响一直是积极的。可以通过加强受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来巩固这些成就。

我们重申，我们确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通过利用预防性外交和预警系统来促进和维护和平、安全及稳定方面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洲的经验证明，各区域和次区域的调解举措对于预防和控制冲突和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有效的。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导致在马达加斯加恢复宪法秩序的政治路线图的签署，这是始于 2009 年 8 月的由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调解的谈判进程的高潮。

联合国仍然是应对目前挑战，包括和平解决争端的适当论坛。然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本组织必须完成正在进行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重申，莫桑比克共和国致力于继续为改革进程提供相关投入，因为改革进程有助于联合国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有效力，从而为巩固联合国的可信性和合法性作贡献，为世界各国人民谋利益。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希望看到振兴大会作用和权威、使其成为联合国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的机构的进程完成。

应该在我们所有国家都享有代表权、每一张投票都很重要的大会作出和评估国际议程上最重要的决定，其中包括和平和谈判解决争端。只有一个拥有必要的权力和权限及充足资源的强大的大会，才能承担起这些职责和应对当前的挑战。

继续值得我们关注的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安全理事会。该机构应以透明、包容各方、民主的方式，注意当代全球挑战的演变和动态，在建设联合国作为全球实体的信誉方面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深信，这些改革将使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更多对话与合作，加强相互关系及与相关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

我们一直适当地注视着北非和中东的社会和政治事态发展。我们认识到，这些事态发展对于有关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社会构成挑战。我们希望，正在开展的进程将利用这一机遇促进和平、扩大自由、推动发展，以及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呼吁所有有关行为体进行建设性对话，努力实现和平解决，以确保和平与稳定。

我们从这些事态发展中吸取了教训，即应该优先考虑内部对话、区域合作及联合国干预行动的公正性。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阿拉伯和平进程缺乏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双方致力于重启谈判，并将谈判转化为具体行动，以实现冲突的持久、全面和公正解决。我们重申明确支持被剥夺了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

我们重申支持建立按照 1967 年边界和平共存的两个国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原则。我们还重申，我

们支持国际社会致力于寻求有利于西撒哈拉人民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支持西撒哈拉人民的合法自决权。

我们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遭受严重干旱和饥荒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兄弟人民的声援。我们赞扬国际社会迄今为减轻痛苦和生命损失所做的努力。

最后，我们重申莫桑比克共和国将继续参与和致力于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阿曼多·埃米利奥·格布扎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多民族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政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多民族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政总统的讲话。

多民族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政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多民族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政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莫拉莱斯·艾玛总统 (以西班牙语发言)：能来到这个论坛非常重要，因为这使我们能够阐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和我们所做的工作，同时，这个机会也使我们能够表达各国总统之间以及各国政府之间的重大意见差异，表达我们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政策、方案、项目、原则和价值观上的差异。

今天上午，我们听取了一些国家总统的讲话，我意识到，所谓的小国、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与一些大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在联合国这里的辩论中，在生命文化与死亡文化之间，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以及在和平与战争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当然，我们有权保持差异。我们有权在生命问题上持有深刻的意见差异，但我认为，我们的组织联合国有责任使各国政府为保障和平和地球上所有人的平等与尊严而持续开展的工作做到协调一致。

当我说在生命文化和死亡文化之间存在深刻差异时，我觉得我们很难理解那种将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经济政策。数据显示，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掌握着世界上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如果存在着这样深刻的差异，我们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呢？如果我们不能消除贫困，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持久的和平呢？

此外，帝国主义企图控制全世界的能源，为此，帝国主义拥有了强加于人、控制和不断入侵的手段。这种情况不只是现在才出现；历来的情况一直如此。我还记得，我在孩提之年看到人们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反抗长期掠夺我们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左翼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为的是要逮捕他们。社会力量遭到了军事干预。人们被拘禁，被流放，被杀害，受到迫害，并被指控为社会主义者、毛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认为必须终止这种情况。我们不再被指控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但现在使用的借口是贩毒和恐怖主义。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丰富的国家，我们受到外国干涉的威胁，因为我们的总统、政府和人民既不支持资本主义，也不支持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在谈论持久和平。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仍然存在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持久和平呢？在军事干预仍然存在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持久和平呢？

我认为，我们的联合国现在是听命于安全理事会。如果少数几个国家就能决定实施干预，进行杀戮，那么联合国有什么用？这个安全理事会是谁的安全理事会？这是那些支持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总统、政府和人士的安全理事会。但对于要求解放——不仅是文化上获得解放，而且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收复其经济资源——的总统、人民或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不

安全理事会。以上就是参加我们辩论的各大洲总统之间的深刻分歧。

如果我们想让联合国享有确保其决议得到尊重的权威，我们就应考虑重建联合国。我们不能继续老调重弹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每年在联合国，几乎百分之百的会员国——但不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应该终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由谁来确保这一决定得到遵守呢？安全理事会绝对不会保障这些联合国决议得到遵守；联合国无法保障全世界所作出的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这项决定得到遵守。

我无法理解一个由世界各国组成的组织为何不被尊重。那么，联合国究竟是何物？现在是就重建世界上这个大型组织的问题进行深入辩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就联合国的作用进行辩论，让联合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认和尊重。只有在重新建立联合国，使之成为一个为了地球上人人享有平等和我们在联合国所代表的所有人的尊严而斗争的机构，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听到不少发言者谈到巴勒斯坦。当然，巴勒斯坦得到我国的全力支持。玻利维亚不仅支持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而且希望欢迎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深刻的看法。当以色列轰炸、袭击、杀害和掠夺巴勒斯坦土地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对之束手无策；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能够阻止对巴勒斯坦的轰炸和杀戮以及在那里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

当洪都拉斯发生政变的时候，保护洪都拉斯人民选出的总统的军事基地在那里？安全理事会或美洲人权委员会捍卫过洪都拉斯的民主了吗？

现在我们对此进行深刻反省的时候了。当出现反帝国主义的总统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政府的时候，帝国便试图制造看来像是重大对抗的内部冲突，让它变得在媒体眼中看来某某总统应该下台了，或是试图分列一个国家，以便为干预找到借口。

当洪都拉斯发生政变和当巴勒斯坦有人被杀的时候，北约组织到哪里去了？安全理事会到哪里去了？它们踪影全无。

为此以及其他很多原因，必须重新思考重建联合国的问题。

我们各国总统和政府如何面对我们的责任，如何让我们的国家获得自由？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作为总统的一些重要经验。

首先，绝不能将我们的自然资源私有化。绝不能将自然资源转交给跨国公司，不论是矿产、石油还是其他自然资源。我就任总统之前，油气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合同上是怎么讲的？合同宣布，所有者享有井口以上的所有权。这些政府告诉我们，只要资源——天然气和石油——在地下，它们便属于所有玻利维亚人所有，但只要一上到地面，便属于跨国公司。在合同中，他们编造了合同持有人获得井口以上所有权的主意；只要石油和天然气上到地面，它们便不再属于玻利维亚人。这是对我们自然资源的持续掠夺。

2006年5月1日，我们通过最高法令，收回我们的自然资源并将之国有化。从那时起，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改变。从那时起，玻利维亚不再是一个乞丐国家。2006年之前——我是抱着诚意这样说的——玻利维亚是个被视为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用什么样的字眼差别都不大。

我们只有1 000万人口。2005年对玻利维亚的投资只有6亿美元，其中50%以上是信贷或国际合作。不到50%是我们自己的资源。今年的投资是多少？答案是36亿美元，其中20%或30%是通过国际合作或信贷，而80%是我们自己的资源，因为我们收回了油气资源和天然气。我们的经济开始改变了！

从1948年到2005年，玻利维亚国库从未有过盈余；玻利维亚一直负债。我们执政的第一年，即2006年，我们有了财政盈余。我们还为儿童和老人建立了担保。除了增加投资外，我们开始让我们的经济民主化。1825年玻利维亚建国，其后的180年里，在2005

年之前我们有多少国际储备呢？答案是17亿美元。在180年里，各式各样的政府——自由、军事独裁、新自由派——只为玻利维亚攒下17亿美元。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我们积累了超过100亿美元；玻利维亚现在有117亿美元的国际储备。

2005年，我们的国际储备排在倒数第二位。现在我们已经全然改观，因为我们收回了油气并将之国有化。收回自然资源，将其掌握在国家手中，对于改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将自然资源私有化并将之转交给跨国公司之手。

我们可以有伙伴。这很好。但公司不能成为我们自然资源的拥有者。国家和人民必须是拥有者。我提到这一经验，是因为我们根据玻利维亚人民的要求作出了决定，我们已开始改变国家经济。

我还要谈第二点。绝不能由私人企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我指的是水电、能源和电话服务。今天上午，一些人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了25%或30%——一些情况下甚至是50%——而且四、五年里一直如此。物价上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控制农业生产。自从国家控制了玻利维亚的基本服务后，电力、电话和饮用水收费没有上涨，因为这些都是基本服务。公共事业必须是国家的责任，不是私人部门的责任。

我们怎能将饮水这一关系到生命的物质交给私人？我欢迎大会给了我们饮水是一项人权的这种支持，我代表玻利维亚人民和政府表示感谢。我们有责任在全世界实行饮水是人权的观念，从而在饮水问题上支持最脆弱的群体。

我的第三点涉及各国人民为争取尊严与主权而不断斗争的问题。在玻利维亚，我也不得不忍受一个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身着美军制服的外人在做什么？如社会中一些部门所知的那样，由于在我之前入主政府大楼“Palacio Quemada”的前几届总统做出的政治决定，这些外人指挥着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没有美国使馆的允许，Chimore机场就不能使用。这给我们敲响了捍卫我们各国人民尊严与主权重要性的警钟。

我刚才描述的情况导致了一场不仅在社会与文化领域、而且在选举方面的伟大运动。它导致了一场政治解放运动，一场让所有玻利维亚人重新享有尊严的运动，也促成我担任我国总统。

我担任总统后，关闭了军事基地。在这个新千年的 21 世纪，怎么还能让外国军事基地继续在世界各地存在？怎么还能让安全理事会来决定是否进行干预？这种情况威胁了人类，打击了世界各国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向联合国提出建议，使我们不仅能够解放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而且恢复他们的尊严。

我的第四点要谈谈国际金融机构。我记得在我还是一名工会领导时，政府绝无可能获得投资的资源。我们被告知，玻利维亚没有借款的能力。玻利维亚没有获取国际贷款的便捷渠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做什么？它给贷款附加了条件。它告诉各国政府，如果将炼油厂和通信业私有化，就可以得到 3 000 万到 4 000 万美元的贷款。

一个放高利贷的银行、带有附加条件的贷款以及有抵押要求的贷款，这些都不是解决办法。国家或生产性部门都得不到贷款。贷款只提供给服务和贸易部门。更重要的是，贷款都给了跨国公司。

在我成为总统时，一个跨国石油公司告诉我，政府必须为建设管道的一笔价值 1 亿美元的贷款提供担保。我不明白其用意。最后证明，这家叫“Transredes”的石油公司有政治阴谋，因此，我们决定将其财产、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国有化。我们赶走了这家公司。然后，我们开始通过国有公司“Yacimientos”进行投资，现在“Carrasco Cochabamba”管道正在建设之中，而我们却没有借一美元。但是，假如仍由那个跨国公司负责的话，我们将肯定不得不为获取其贷款而提供担保。

如大会所了解的那样，我是从土著农民运动起家的。当我的家人谈到公司时，他们认为它一定有很多钱，是由百万富翁组成的。所以我无法理解公司怎么能要求政府借钱给它进行投资。

国际金融机构是通过公司来运转的，但是谁须付出代价呢？是各国人民，各国政府。所以，我们必须创建其它金融机构。幸运的是，我们正在南美洲取得良好进展。南方银行将与那些只顾谋取私利、通过投机赚钱的放高利贷的银行截然不同。必须杜绝这种现象。区域一体化将把我们从这些银行的垄断中解放出来。

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玻利维亚面临必需克服的障碍，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其它国家也有问题。例如，我们历史上需通过智利这个主权走廊才能通往太平洋。我们决定向国际法庭提出使用这一通道的诉求。1982 年 11 月 15 日的第 37/10 号决议在其附件《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中明确指出，向国际法庭提出诉求以解决国家间争端不应被视为不友好之举。

玻利维亚有权利也有理由向国际法庭提出诉求，因为是一场不公正的战争、一场侵略导致我国成为内陆国家。对玻利维亚来说，呼吁在国际领域中解决问题意味着为玻利维亚纠正一个历史不公。

玻利维亚是一个友好、和平的国家，它把与其邻国的对话作为优先事项。因此，我们保持了与智利双边谈判的开放渠道，然而同时又不放弃向国际法院提出诉求的权利。区域也参与了进来，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双边问题，也是一个区域性问题的。

人民不是造成玻利维亚成为内陆国家的祸源。那些罪魁祸首始终是希望保护其获取自然资源渠道的寡头组织和跨国公司。1904 年的条约没有带来和平或友谊，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玻利维亚仍未拥有自己的主权港口。我借此机会呼吁联合国、其它国际组织特别是本区域支持我们，以便我们能拥有主权直通太平洋。

此外，还发生了另外一场国家运动，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开展的运动。我要说，这是一个不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新的美洲国家组织，它旨在借鉴我们在南美洲国家联盟中的有益经验，把我们从某些

强制措施中解放出来。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不再认为自己不得不在发生国家间和民间政体间冲突时，让一些局外人来居高临下地重建秩序，而是通过各国总统与政府会面来解决内部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伟大的解放。

我还借此机会简要谈一个核心话题，即打击毒品贩运的问题。美帝国主义正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打击毒品的战争。驻玻利维亚的美国缉毒署并不是在打击毒品贩运，而是控制它以谋取政治目的。美国缉毒署会将工会领导人或反帝政治领导人牵扯进来。

该帝国企图将我们拖入贩毒泥潭、且仍在继续的龌龊之举是许多政客的救命稻草。上周，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称，我的飞机由于发现有少量可卡因而被扣留在美国。这真是荒谬至极！它们企图混淆视听，对我国政府和玻利维亚国进行肮脏攻击。

美国做了什么？它取消了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核证资格。美国是世界主要毒品消费国，也是世界上大麻的生产国之一——在某些年份，它还是大麻最大的生产国——它有什么道义权威核证拉丁美洲国家或取消它们的核证资格？它有什么权威核证任何一个国家或取消该国的核证资格？这是又一个企图恐吓它国或惩罚它们的做法。

然而，玻利维亚仍高度负责地继续打击毒品贩运。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承认，由于加强了毒品阻截，古柯种植量出现净减少。市场在哪里？市场是推动毒品贩运的驱动力，而市场就在这里。谁会因为美国没有减少市场需求而取消其核证资格？今天上午，墨西哥的卡尔德龙总统提到，毒品市场在继续扩大。为什么不对铲除这个市场负起责任？只要市场存在，古柯叶和其它产品就会被转为毒品。

必须承担起重要责任。在此我发出一项呼吁。让我们抱着共同的责任感来打击毒品。为什么我们不结束银行保密的做法？最大的毒品贩子不会把他们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放在手提箱或背包中，而是放在银行里。为什么害怕银行不守密？我们玻利维亚就不害

怕。如果我们想迎头痛击毒品贩运问题，就必须结束银行守密的做法。

资本主义危机的连带危机之一是粮食危机。新的国际金融架构通过为小型生产者提供小额信贷，而给低收入人民提供了机会。我们玻利维亚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以零利率向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生产者提供贷款。粮食生产者甚至可以用其产品来支付其债务。为鼓励粮食生产，还提供了软性贷款。

然而，国际银行却从不考虑小型生产者；它们从不理会若有机会就完全能做出贡献的合作社和协会。

有新的办法，可以通过公平贸易来鼓励生产。我们必须结束所谓的竞争性市场。在竞争中谁是赢家？是那些最强大、拥有最大优势的方面。跨国公司永远是赢家。输家则是小型生产者，是那些想通过自身努力崛起的家庭。因此，我们正在本区域努力实行相辅相成和互相声援的政策，而不是竞争的政策。我们永远无法靠赤裸裸的竞争来解决贫困问题。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的危机没有出路。在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穷国的外债问题就被大量提及。据说，这些外债永远也付不清。而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穷国的债务可以轻松解决，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却是一个无底洞。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不只是各种情况的偶然；它是结构性的。

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做什么？他们寻找任何借口侵略别国，攫取其自然资源。今天上午，美国总统说，伊拉克已经自由了，并将自己管理自己。当然，伊拉克人终将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但是现在石油却落到了谁的手里？

人们欢呼利比亚的独裁统治结束，现在拥有了民主，但是利比亚的石油落到了谁的手里？世界和利比亚人民认识到，侵略与轰炸的原因不是要让叛军打倒卡扎菲，而是想夺取利比亚的石油。到明年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局势，看看哪些国家霸占了利比亚的石油。

有人想利用我们的石油、天然气和其它自然资源，来应对资本主义危机。但是，我们也担负着捍卫

地球母亲权利的重要责任。我仍深信，捍卫人权的最好办法就是捍卫地球母亲的权力。

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看护地球母亲权利的重大职责。仅仅 60 年前，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仅仅 60 年前，联合国意识到人类也享有权利。除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土著人民权利之外，我们现在还担负着捍卫地球母亲权利的巨大责任。

我们还深信，在有限的星球上寻求无限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能的。增长要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为限。因此，我们呼吁在社会需求、金融体系、自然资源、基本服务、生产以及尊严与主权方面遵循新的十诫。我们应在此基础上重建联合国，以使其能够成为解决和平、贫穷、尊严与主权问题的最高论坛。

我希望我作为玻利维亚总统的经验可供在坐各位借鉴。与此同时，我来此也是要向你们中的许多人学习，以便我能继续为玻利维亚人民的平等与尊严而努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宪制总统刚才发表的讲话。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宪制总统胡安·埃沃·莫拉莱斯·艾玛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达尼洛·蒂尔克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听取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达尼洛·蒂尔克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达尼洛·蒂尔克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对大会讲话。

蒂尔克总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祝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当选，并表示，我们相信他的智慧和经验将帮助他出色地指导大会的工作。

我也要对卸任主席约瑟夫·戴斯先生为大会和联合国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表示我们的真诚感谢。

显然，我要特别赞扬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并且感谢他以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为联合国工作，感谢他为促进《宪章》精神而不懈努力。我们深深赞赏他的领导能力，并祝愿他在第二个任期内，在指导联合国渡过目前充满挑战的时期中继续取得成功。

斯洛文尼亚欢迎大会主席作出决定，把调解这个主题作为本届会议我们讨论的中心。确实，在目前寻求找到办法实现和平解决以巴冲突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个主题更加适时了。斯洛文尼亚所属的欧洲联盟目前正在这方面全力开展高级别调解工作。目前开展的调解有两个目标。

第一是重振和平进程，以期早日找到解决方案，即，一项真正公正的和平协议，它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将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处的国家。第二，目前与联合国有关的一项任务是，在我们这个共同的全球组织中为巴勒斯坦找到合适的位置。事实上这两个目标相互联系，应当把后者理解为对前者的支持。

我们的共同组织——联合国——致力于其包容性特质和会员国的普遍性。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看到了今年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

我们欢迎南苏丹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最新的一个会员国。本组织应当在这个新会员国努力建立其机构并为其人民福祉服务时，为它提供一切协助。

我们也欣见，大会决定将利比亚的席位给予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代表。在利比亚人民遵循人民意愿，努力建立合法、民主和有效机构并且寻求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道路的时候，这样做建立了联合国与利比亚人民之间亟需的联系。

昨天，我们在一次高级别特别会议上较具体地讨论过协助的形式。今天，我们可以说，利比亚人民与联合国以及区域组织，特别是同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开展有效合作目前有很好的成功机会。携手合作，

我们将有更好的能力来提供协助。斯洛文尼亚愿意继续在这一框架内尽自己的责任。

政治和安全关切历来是联合国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但是，必须以其它长期和短期优先事项为背景来审视它们。本组织推进了它在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最重要和最困难问题上的参与。我们必需朝着建立一个有效的新体制迈出坚定的步伐，以便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确保做出必要的调整。

我们希望，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使我们离达成最后协议更进一步。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不成比例。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独特挑战，它们的特点使它们属于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列。

将于明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是一个机会，以确保对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政治承诺，评估在兑现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且应对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挑战。我们应当加强努力，以便形成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发展观。我们有义务使局面改观，而要这样做，需要有更全面的发展定义。

在继续侧重于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同时，我们应当特别关注非洲，尤其是最需要援助国家的特殊需要。《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提供了在最不发达国家改善进展状况的具体解决办法。

在捐助国出现经济危机而且危机似乎继续有增无减的时期，事实证明难以实现增加援助的目标。提高援助实效至关重要。

如果贸易、农业、移徙、气候变化等其它政策抵消发展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发展领域将一无所成。在这方面，请允许我表示，我们希望今年晚些时候将在釜山举行的高级别论坛成功展开讨论。

最近在发展活动方面获得的经验提高了人们对于发展与人权之间关系的认识。发展权这一理念正在变得充实，并且得到承认。此外，具体发展任务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联系的重要性。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是

与此有关的一个事例。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经验和研究表明，在农业方面增强妇女的权能可以把饥饿减少 30%。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这一成果都令人印象深刻。

对于促进和平、安全，尤其是发展，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至关重要。斯洛文尼亚坚决支持联合国妇女署的工作。妇女署将帮助显著加强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扩大机会以及在全球应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努力。

在人权领域，斯洛文尼亚高度重视的另一个优先事项关系到儿童权利和接受人权教育的权利。今年，作为儿童基金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斯洛文尼亚为实现普遍批准《儿童权利公约》两任择议定书作出了不懈努力。目标应当是通过联合国的文书和国家行动，确保切实保护儿童权利，并且改善世界各地儿童的福祉。

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人权教育有关，这种教育有助于增强青年的力量，以努力确保他们在社会上的适当地位。我记得，近 20 年前斯洛文尼亚和哥斯达黎加在第三委员会启动人权教育运动时是什么情形。我们高兴地看到，如今人权正日益成为学校正式课程的一部分。但是，为了把人权学习作为一个终生过程纳入各个社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多。我坚信，联合国及其人权理事会和大会将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我要表示，我对人权理事会在其今年 3 月届会期间通过关于人权教育和培训的宣言草案感到满意。我呼吁所有国家支持这份重要宣言。我相信，大会将在今年秋天晚些时候通过——我希望是一致通过——这份宣言。

人道主义灾难状况下的人权关切问题是最悲惨的。目前非洲之角的饥荒就是一个不幸的例子。这场危机事关人的存亡和人权。所有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包括我国斯洛文尼亚，都已经在努力提供帮助。但是需要更多的帮助。必须扩大人道主义援助。

我简要提到了斯洛文尼亚认为特别重要、特别参与其中并且开展了特定活动的一些领域。我们坚定致力于联合国，并将继续坚定不移。

联合国是一个属于所有人和为所有人服务的组织。迄今近 20 年来，斯洛文尼亚一直作为一个忠诚的会员国开展工作。我们提出了具体的行动建议，而且无论其余会员国是大国还是小国，也无论它们与我们近在咫尺还是相距遥远，我们都乐意与它们合作。我们在具体提议、决定和执行方面开展了合作。

我们还提出了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整套想法。我们希望，即将来临的一年将目睹这方面迈出更坚定的步伐，并且取得比迄今为止更大的进展。

联合国是其会员国的一个重要希望——全世界的希望，也是一个机会，以便让现实更接近我们的希

望，哪怕现实有可能是复杂和困难重重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斯洛文尼亚提交申请竞选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我们希望得到广泛支持。

如果我们当选，我们将作为联合国的忠实会员国，意识到安全理事会及其所有成员对整个联合国组织和所有会员国的责任。我们承诺我们将努力工作、明断是非和公平行事，以此为联合国作出贡献。公平是国际社会最需要的商品、原则和价值观。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斯洛文尼亚总统刚才发表的讲话。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达尼洛·蒂尔克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下午 8 时 05 分散会。